

# 但耸危言济盛世

## 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

黄彦 / 著

HUANG YAN · DAN SONG WEI YAN JI SHENG SHI

旧的《创世记》只是神话  
新的《救世记》才是真正的圣经

新千年是远比二十世纪危机深重的人类大劫大限  
新希望只源于亿万生灵超越自我的革命大彻大悟

作家出版社

# 但耸危言济盛世

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

黄彦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但耸危言济盛世：〈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 / 黄彦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7-5063-8392-9

I. ①但… II. ①黄… III. ①社会史学—研究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0764号

## 但耸危言济盛世：〈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

---

作 者：黄 彦

责任编辑：王宝生

装帧设计：刘 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230千

印 张：16.25

印 数：001-5000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92-9

定 价：29.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世纪末参加“人类危机学大系”第一次策划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他们是高放、许亦农、黄彦、周国平、王舟波、李晁生、王华、高华、曾宪东、杨桂兰、商向君、王志明等。





高放近照      简传见12页



著者照

黄彦 1936年4月10日生于四川资阳。新华通讯社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先后任《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执行总编辑。中学时入党。学生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并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参加由国内最著名几所大学教师集体编著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尔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52年，1986年调入新华通讯社。青年时代即加入文学、音乐及社会科学六种协会、学会。35岁转务文艺，发表各类作品、文章两千余篇。著述涉面甚广，品类繁多。主办、主编过《实践》《奔马》《资料卡片》《诗选刊》《世界军事》《世界报刊选粹》《中华辞赋》七种刊物。主持编辑出版大型图书《白话资治通鉴》《民族文化百科全书》。主编出版《天安门上看中国》《黄彦序跋文论集》《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防左备忘录》等著作。正在编撰《黄彦对联千副大观》。曾任多家出版社、杂志社、诗社正副主编、总编辑、顾问、特约编审。为各类图书、报刊撰写序言、发刊辞及社论近百篇，辞赋评论尤多。兼任一些文化社团及报刊荣誉职务。曾任华夏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执行副会长。主持多届全国作文大赛等文化工程。

(杜修贤 摄影)

## 序 言

# 确立“一球家园”理论，加强全球综合治理， 必能根治人类危机

高 放

黄彦著《但耸危言济盛世》是奇人、奇才所写，具有奇观、奇异、奇特、奇妙四个特点的奇书。当今要根治全球人类严重危机必须确立“一球家园”的新理论以取代以往“两个阵营”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以便凝聚一致共识、制定一致规划、形成一致方案、采取一致行动、总结一致经验、反复一致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全球综合治理，尽量发挥联合国、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要为全球综合治理做出重大贡献，发挥重大作用，这样必能在各国广大民众中提高社会主义感召力，推进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

### 一、《但耸危言济盛世》是应当前社会急需由奇人、 奇才写成的奇书

18世纪末突起的蒸汽化浪潮、19世纪末兴起的电气化浪潮和20世纪末激起的信息化浪潮，这三次现代化、全球化滚滚不息的大浪潮，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现在人们足不出户，从家中彩色电视和电脑网络，甚至只凭一部灵巧的智能手机，就可以亲眼目睹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新科技革命和社会的变革，既促使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进步，然而又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未有的大危机。核泄漏、核爆炸、核战争、核冬天，严

重危及人类生存。气候变暖导致南北极融冰、海平面上升，将危及众多城市和岛国被淹没。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思想危机、人口爆炸危机、生存危机（传染病、空气污染、饮水污染、食品污染）等等更是不胜枚举。2014年《纽约时报》12月4日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2月6日都推荐当年最畅销的优秀图书之一是伊·科尔贝特著《第六次物种灭绝：一段违背自然规律的历史》。这位女科学家依据亲身实地考察，证明因气候变化已对地球20%至50%的物种生存造成严重威胁，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第六次物种灭绝的空前浩劫。英国宇宙学最高权威斯·霍金于12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忧心忡忡而又言之凿凿地发出警告：“全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因为缺乏人脑理性的智能电脑终究会做出消灭人类的蠢举。可见当今世界的各种危机已达到人类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如何观察与思考世界各种危机的危害和根源，尤其是如何找出应对、根治全球危机的治标和治本的方略，这些正是广大读者迫切需要给予有力解答的问题。黄彦同志历时十多年尽心竭智撰写的这本《但耸危言济盛世》，正是为满足当今社会大众急需的应时力作。

我同黄彦同志有近一个甲子的长年交往。1956年他从四川资阳高中毕业时本来已报考北大中文系，却优先被我从1950年起就在这里执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提前录取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他说他是带着我于1954年出版的《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执意要师从我。1960年他毕业留校与我共事，成为知心好友。1962年因经济极为困难北京要疏散100万人口，我们教研室就有八名青年教员被调至外省工作，他被调到内蒙古从事理论刊物《实践》编务。1971年后转去从事他早年就很喜爱的文艺工作，创作诗词楹联歌赋等多种形式的丰硕成品。2011年出版《黄彦序跋文论集》（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我在该书序言中曾经盛赞他“不愧是巴蜀奇人奇才奇葩”。现在通读他这部20多万字的《但耸危言济盛世》，进而感到这真是一部古往今来的奇书。中外古今谈论危机的书，尤其是探究当今世界深重危机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大

多是分门别类叙述各个领域的危机，综合理论者也多是局限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也另有以文学作品形式描绘生态危机的大众化作品。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美国蕾切尔·卡逊著《寂寞的春天》（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多种中译本）。黄彦这本奇书与以往各种谈论危机的书相比较，称奇就奇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指导思想来看，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以宽广的视野由此及彼通览世界各种危机，更以深邃的目力透视世界各种危机，揭示了全球邪恶势力的丑恶行径和深重时弊，展示了当今世界纷繁驳杂危机的奇观。作者依其雄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高强的研究能力，深入的独立思考，常年的知识积累，多彩的文字修养，纵横捭阖，恣肆汪洋，所以能够铸就这本蔚为奇观的佳作。

第二，从涉及学科来看，全书涵盖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大学科，其中涉及人学、人类学、人性学、人生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众多分支学科。可以说这是一本罕见的把多门科学与文学、美学融为一体的博学广识的奇异成果。既史论结合，又论从史出。全书做到了学理的灼灼光辉和艺理的奕奕光彩交相辉映。

第三，从全书内容来看，各章结构和标题，依次显示出严密的思想性和逻辑性。首先警示人们要敢于正视危机，其次揭示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人性的十八个弱点，再次展示对待危机的乐观与悲观两种迥异态度，复次昭示当代人类物质丰裕与精神贫困的颠倒现象和缘由，又次醒示人类联合起来扭转危机之路，最后预示中国在克服危机中的作用与责任。全书六章的六种宣示，展现出奇特的景象。

第四，从全书形式来看，在文字表述上不仅采取社会科学论著通常使用的以事实实证和以理性推理的形式，而且讲究辞赋华章诗歌词语的对仗排比。例如第一章开宗明义这样写道：“但耸危言，可济盛世；但忌危言，必致末世。谈危色变，引起癌变；厉言正色，方为本色。”第二章论及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弱点时提出：“苛政猛于虎，人祸大于天”，等等。全书奇思妙想，多有嘉譬巧喻，使用了大量精粹



语言和生动文字，妙语连珠，警言成串。不仅可读性强，而且引人入胜，沁人心脾，激人灵感，启人深思。真可以说是既深含学理，又赋有文采的奇妙杰作。

具有奇观、奇异、奇特、奇妙这样四奇的奇书，值得读者认真细读，精心鉴赏。当然，本书还有表述不当、比喻不妥、论证不周之处。我读后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还望读者继续指正。

## 二、根治危机要确立“一球家园”理论

我从1950年起，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的教研工作，从1986至1997年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现在我想从社会主义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对本书作些必要的补充。

自古以来有众多仁人志士、社会精英著书立说，有不少明君贤相、政要高官决策践行，力求治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種危机。他们所采取的方略无非是从科学技术、政策法律、道德伦理、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着手，缺少统一的科学理论作为总的指导。

自从16世纪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多国兴起以来，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社会进步大踏步向前。然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急剧加深，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畸形、思想腐蚀、道德败坏、社会混乱、生态破坏等等多方面危机愈益严重。于是，从1516年出版英国人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一书起，西欧多国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涌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危机。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既含有合理的科学因素，又具有虚无空想的性质。从1844年起，德国青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发表一系列论著，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他和亲密战友弗·恩格斯密切合作，终于把混杂理想与空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升华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定：由工人阶级先进政党领导人民大众掌握国家政权后，逐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即可根治人类社会各种

危机，使人人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较为发达的德、法、英三国首先取得胜利。

到20世纪，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却首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列宁等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指望德、法、英等发达国家也能很快紧步跟随，尽快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据我考证，在1924年制定的苏联宪法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概念。这部社会主义宪法在开头就提出：“自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已分裂为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说法盖源于此。但是实际上的世界两个阵营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把苏联和东欧七国、亚洲四国连成一片，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由十二个国家抱成一团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峙、对抗到60年代中期，因中苏两党分歧严重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

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两个阵营理论破灭之后，毛泽东主席于1974年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于1974年2月22日同非洲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讲道：由于苏联已经变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掌权的国家，所以他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是两个阵营理论的新变化、新发展。其中心思想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众多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两霸第一世界，争取、分化中间派第二世界，或者使其中立。“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指引当时反对战争危险与危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而且也是当时缓解和克服各种社会危机的理论导向。

从60年代起，以信息化为龙头的新科技革命，开始掀起全球化、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从此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联系越来越密切。加拿大著名学者、现代传播学奠基人马素·麦克卢汉（1911—1980）于1967年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一书中预见到电脑将加速媒体传播和密切人们交往时，首创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我在1994年，以《全球一村，大势所趋》为题发表过谈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未来发展前景的文章（原载《国情国力》1994年第12期，收入高放文集之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49页）。当今我想应该进一步提出“一球家园”（the only home on Earth）的新理论，这是对以往“两个阵营”论和“三个世界”论的新超越。所谓“一球家园”就是“一个地球，全体人类，全球一村，共同家园”的简称。我之所以简称为“一球家园”，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为了突出“一球”的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以此与“两个阵营”和“三个世界”的“两”和“三”相对应。当今观察、思考与处理全球问题，要着眼一个地球、人类一体、同一村庄、统一家园，不宜再把全球截然分割为两三个部分。其二，“一球家园”理论能促进全球人类不分国别、族别、教别、派别，凝聚一致共识，制定一致规划，形成一致方案，采取一致行动，总结一致经验，反复一致实践，来共同根治全球危机，共同建设繁荣、民主、文明、和谐全球家园。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和手机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愈益促使人们要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国家对立的传统观念，要超越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举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清除各种危机的传统观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一个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各地区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各国理应和平共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

我之所以敢于斗胆提出“一球家园”的新理论，取代以往的“两个阵营”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有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明确论述作为依据的。邓小平于1985年3月4日率先发表了题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谈话，他敢于以和平与发展取代以往的战争与革命作为当代世界主题，就是从一球全局来观察、思考和处理当代世界问题的。随后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起，直至2012年中共

十八大，一直都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这里摘引的这几句至理名言可以说是对一个地球，人类共同命运的最简要最精辟的说明。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要如何观察、思考和治理世界大事做了更为精要的论述。他于2012年12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座谈时更加深刻地阐发了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27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又讲道：“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务必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解决全球性难题，促进全球性均衡发展。

要根治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空前严重的全球危机，我想我们首先必须超越传统的“两个阵营”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各党派之间固然存在矛盾与斗争，但是在全球面临空前严重危机之际，理应把全球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只有在“一球家园”理论指引下，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不分国别、族别、教别和性别，不分阶级、党派、主义和社会制度，紧密联合起来，尽力减少内斗内耗，不断加强团结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坚决反对政经霸权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坚决联手根治全球深重危机，这样才能趁危转机，化危为安，安居乐业，和谐共处。

### 三、加强全球综合治理是化危为安之大道

本书第六章专谈中国在根治危机中的作用与责任，这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在“一球家园”的前提下，更要强调与加强全球综合治理。全球治理是西方新兴的一门重要学科。“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英文中早在14世纪就已出现。它源于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原意为引导、操控、支配，后来它等同于government，并被它所取代，通常指政府的管治。到90年代，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第三次浪潮（即继蒸汽化、电气化后的信息化浪潮）的汹涌，西方人又开始重新使用“治理”（governance）一词，它不仅指政府的管治，而且也不同于传统从 upper 而 down 单纯行政式的管理（manage）。我认为治理是多主体、多渠道、多方式、多规制的大治。赋予“治理”以新含义，最早是18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这个词组，用以概括说明南部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现状，同时提出治理方案，以促进这个地区的改革。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共产党当时都集中关切东欧和苏联先后发生剧变问题，唯有社会党国际关注“治理危机”问题。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维利·勃兰特（1913—1992）于1992年他卸任临终前发出“治理危机”的号召。随后时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英瓦尔·卡尔松继续推动全球治理危机的事业。1995年社会党国际正式发表《我们的全球之家行动纲领》，要求各国社会党为治理全球危机而采取行动。社会科学界同时热衷研究治理危机问题。治理理论首创者英国学者詹姆斯·罗森瑙于199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没有政治统治的治理》，主张要在政府以外寻求社会力量来治理全球危机。1991年底埃及人加利就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后，由他倡导于1992年成立了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并且于1995年出版《全球治理》杂志。在创刊号上罗森瑙又发表《21世纪的治理》，展望新世纪加强全球综合治理

的前景。联合国开发总署在1996年的一份年度报告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提出了综合治理全球危机的具体设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也发表《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于1998年第3期出版“治理”专号，要求多学科共同参与全球综合治理。世界银行欧洲部副总裁、全球治理学著名学者J·F·理斯查德于2003年出版《2020年：20年解决20个全球问题》（已有中信出版社中译本）。近年来西方学术界还进一步推出了“善好治理”（goodgovernance）即善治理论和智慧治理（intelligentgovernance）即“智治”理论。善治理论和智慧治理为全球综合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善谋和智谋。

在联合国和多种国际组织、多国政府、多种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十几年来在综合治理全球危机和各种全球难题这个艰巨事业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阻抑生态危机的某些方面就有罕见业绩。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2014年9月12日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在日内瓦发布的消息称，修复臭氧层的工作进展良好，有望在205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如果世界各国不是自1987年签署《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减少人造氯氟烃释放的氯和溴破坏臭氧层，那么到2030年全世界每年将增加200万人皮肤癌病例。可见只要各国加强全球治理，定能如愿收到成效。

当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综合治理多种危机依然任重道远。首先要大力加强联合国全局性的组织与协调作用。联合国当今已是193个主权国家联合组成的唯一最大的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理应肩负全球治理的重任。我们诚恳地建议，要把1992年联合国成立的作为社会咨询机构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升格为联合国正式的专门机构。为了不增加联合国的编制与开支，可以考虑把全球治理委员会应该负有的职能分别交付给联合国现有的各个组织。其次，还要发挥其他各种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危机方面的协助作用。最后，要加强各个地区国家政府间的组织在根治全面危机方面的地区性

作用。如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会恪尽自己力量积极参与全球综合治理危机的紧迫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1月28日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49页）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10月15日在罗马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演讲时表明中国愿与各国携手消灭饥饿。他说饥饿与贫困是深深困扰全人类的“无声的危机”。当今全球还有8亿人面临饥饿的威胁。他当场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支持农业“南南合作”。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强国，只要在根治全球危机、促进全球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发挥重大作用，就必能在全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提高社会主义的感召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鉴于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当今的对外战略方针，依我体会主要是：不树敌、不对抗、不结盟、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多交友、多对话、多合作、多助人、多输出多种多样产品。遵循“五不”、“五多”方针，必能真正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西方反全球化群众运动中还有人不明真相，出于执意要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因此并不信甚至反对全球治理危机。同时，国内外思想理论界迄今还有一些人仍然受传统“两个阵营”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束缚，一心总想结成国际反美反霸统一战线，再次掀起世界革命，力图一举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各种危机。殊不知，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尽管危机深重，然而由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机制较为妥善，饥寒交迫的人群较为稀少，资产阶级的法制较为完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较为充分，总有人会为缓解危机出谋划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动崩溃，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难以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世界革命难以促成。

从1988年起，我曾经多次撰文论证：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社会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景，从当今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只能是通过全球综合治理，不断逐步向前推进，最终达到世界大同。当今我国思想理论界还有人甚至坚决反对“全球治理”的提法，坚决反对我国学者申报“全球治理”的项目。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对全球综合治理危机的研究。即使有人仍然反对“全球治理”，我们也耐心等待他们写出充分的论证。如何根治全球危机这个重大问题，是需要学界有识之士通过百家争鸣，共同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案，以供世界各国执政者和各国人民思考、采纳和践行。

肃此为序，敬请垂察。

2014年12月1日写成，18日修订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 高放简传

高放，福建省长乐县龙门村人。1927年2月4日生于福州市一个职员之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学生民主运动。1948年投奔晋冀鲁豫边区参加解放斗争。被吸收后，师从红色教授何干之。1949年3月随华北大学队伍从河北正定迁进北京。协助何干之辅导新学员。194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理论文章。1950年入党。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执教。从1950年至1956年教苏联共产党史。1960年重新执教。并开始按中央指示组织以人大为主，联合北大、北师大等全国五所大学教师共同编写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作。人大第一副校长胡锡奎（后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名为主编，实际由理夫和高放统领全局。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开始带研究生，1963年被评为副教授，任系资料室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3—1978年人大停办期间转到北大国际政治系执教。

1978年8月重新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先后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苏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1959年任校学术委员、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副主任，并且开始执教硕士研究生。发表有重大影响的《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论文。1980年接续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重要论文，并被评为全校先进工作者。1981年以副教授身份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也是国际共运史学科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同年当选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政治学会理事。1982年出版《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专著，荣获